

四川西昌市大厂遗址 M1、M2 发掘简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
西昌市文物管理所

摘要：2016 年 8 月至 10 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四川西昌市阿七乡大厂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了 2 座土坑墓，出土了 20 余件陶器。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初步判断，墓葬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

关键词：四川西昌市；大厂遗址；土坑墓；陶器；新石器时代晚期

一 前言

大厂遗址位于四川西昌市阿七乡大田村一组，地处安宁河西岸二级阶地前沿及缓坡之上，高出安宁河河面约 40 米，距安宁河河道约 1500 米。遗址所在地地势由西向东倾斜，遗址两侧及中部分布有东西向季节性冲沟，冲沟之间为两道较平缓的脊梁，脊梁即为遗址主要分布区。遗址呈东西向分布，东西长约 150、南北宽约 100 米，总面积约 15000 平方米（图一）。

2014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成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建设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该遗址。2016 年 8 月至 10 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西昌市文物管理所联合进行了考古发掘，在遗址东部清理土坑墓两座（分别编号为 2016SXADM1、2016SX-ADM2，以下简称 M1、M2）。现将此次发掘的情况简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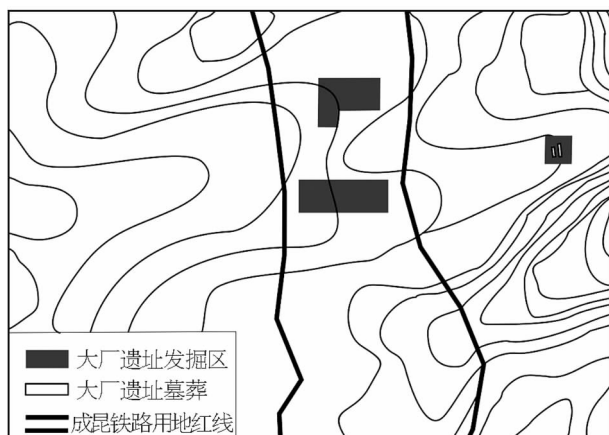
二 发掘情况

M1、M2 位于遗址东部，M2 位于 M1 西侧，



图一 大厂遗址位置示意图

相距约 1.4 米（图二）。2014 年改土对墓葬造成较大破坏，现存墓坑均位于耕土层之下，并直接打破生土。



图二 大厂遗址 2016 年发掘区域及 M1、M2 位置示意图

(一) M1

墓向 337°。竖穴土坑墓，东部已被破坏。现存墓坑开口距地表约 0.15 米。墓口南北长 4.34、东西残宽 0.54~0.74、残深 0.3~0.4 米。墓坑内填土为黄色粉砂土，较纯净。残存随葬品共 7 件，均为陶器，分置于墓坑的南北两端。墓坑内未见人骨、葬具，故其葬式、葬具不明（图三~五）。

出土器物 7 件，均为陶器，包括壶 2 件、带流壶 1 件、杯 2 件、残器 2 件，且破碎严重。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另有少量夹砂灰褐陶。陶器烧制火候较低，可能由于烧制时氧化的程度不同，陶色不纯，部分陶器出现外红内黑的现象。陶器外壁均经过抹光处理，大型器物多在颈、肩或腹部施有纹饰，包括弦纹、戳印纹、刻划纹、附加堆纹及由前几种纹饰组成的复合纹饰等。陶器多为手制，其中较大的器物用泥条盘筑法，部分小型器物和附加堆纹等则直接用手捏塑而成。

陶壶 2 件。均残，口、颈、肩局部可复原。夹砂红褐陶。喇叭口，方唇，长颈，鼓腹，平底。器形高大厚重。M1：3，方唇微卷，斜弧肩。颈肩部施有两组以弦纹、刻划纹和戳印纹组成的复合纹饰。口径 18 厘米，口、颈、肩部残高 25 厘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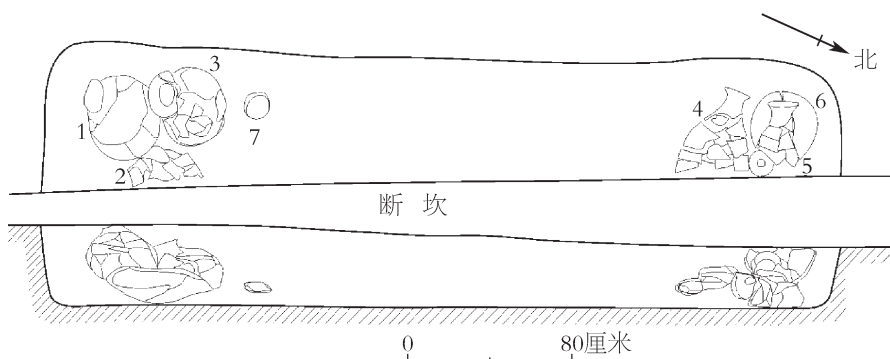


图三 M1（北→南）



图四 M1 墓坑南部器物（俯视）

六：1）。M1：6，方圆唇，斜肩。沿下至肩部之间饰七周刻划而成的弦纹，最下两周弦纹之间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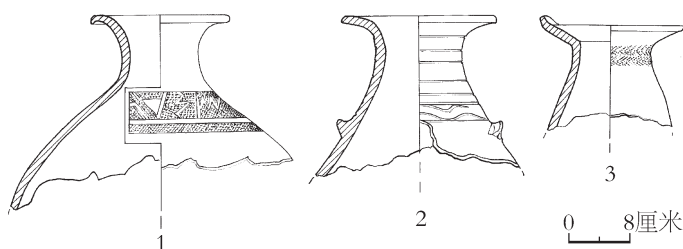
图五 M1 平、剖面图

1.陶器 2.陶器底 3、6.陶壶 4.陶带流壶 5、7.陶杯



有两道不规则横向波浪形刻划纹，最下一周弦纹下即肩部饰有两个对称的角状附加堆纹。口径 20 厘米，口、颈部残高 22 厘米（图六：2）。

陶带流壶 1 件。M1：4。残，口、颈部可复原。夹砂灰褐陶。喇叭口，方圆唇，折沿，口部有一微上翘浅平流，长颈，斜肩。颈部施有两组由戳印点线纹组成“<”形并密集排列的复合纹饰，两组纹饰之间以刻划而成的弦纹分隔。另根据碎陶片可判断为鼓腹，平底。器形高大厚重，口径 16 厘米，流、口、颈部残高 15.4 厘米（图六：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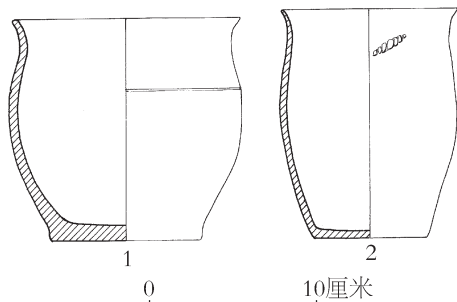


图六 M1 出土陶器

1、2.陶壶（M1：3、M1：6） 3.陶带流壶（M1：4）

陶杯 2 件。均残，可复原。夹砂红褐陶。侈口，尖圆唇，深腹微鼓，平底。外壁抹光。M1：5，肩腹部饰以一周刻划而成的弦纹。口径 13.8、腹径 14、底径 8.8、通高 13.4 厘米（图七：1）。M1：7，沿下颈部施有一对称长约 4 厘米的斜向橄榄形附加堆纹，附加堆纹表面通过压印而呈锯齿状。口径 10.6、腹径 10.6、底径 7、通高 13.8 厘米（图七：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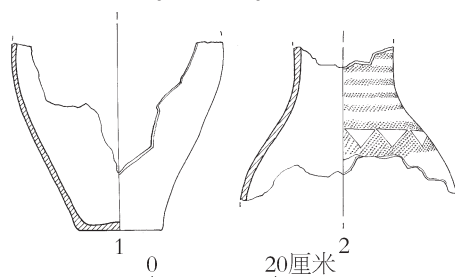
残陶器 2 件。仅存器底或颈肩部。M1：2，残，仅存腹、底局部。夹砂红褐陶，外壁经过抹光处理。外壁局部可能因烧制时的火候不均而呈



图七 M1 出土陶杯

1.M1：5 2.M1：7

黑褐色。鼓腹，平底。残存部分均为素面。残高 30、腹径 34、底径 13.6 厘米（图八：1）。M1：1，残，仅存颈、肩、腹局部。夹砂红褐陶。长颈，斜肩，鼓腹。外壁经过抹光处理，颈部施有五组以斜向排列的戳印点线纹组成的带状纹饰。肩部施有以刻划纹、戳印纹组成的复合纹饰，复合纹饰中部刻划出留出边长约 3~4.5 厘米的连续倒立三角形，三角形内部未施纹饰。残存部分高 30、腹径 36 厘米（图八：2）。



图八 M1 出土陶器

1.器底（M1：2） 2.陶器（M1：1）

（二）M2

墓向 344°。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仅存墓坑底部。现存墓坑开口距地表约 0.15 米。墓口南北长 3.2、东西残宽 1~1.04、残深 0.22 米。墓坑内填土为黄色粉砂土，较纯净。残存随葬品共 20 件，均为陶器，分置于墓坑的南北两端。墓坑内未见人骨、葬具，故其葬式、葬具不明（图九~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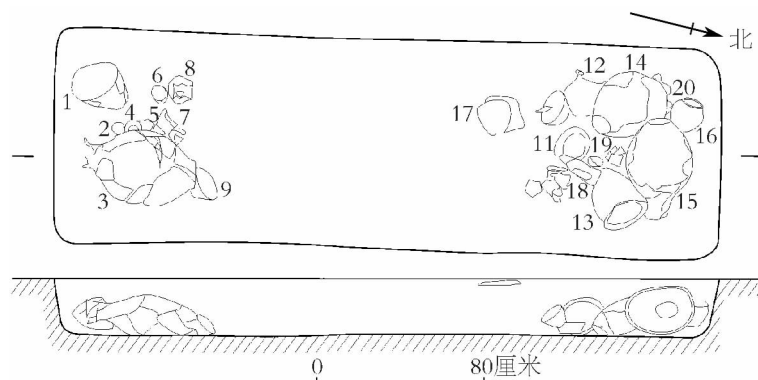
图九 M2（北→南）



图一〇 M2 墓坑南部器物 (俯视)



图一一 M2 墓坑北部器物 (俯视)



图一二 M2 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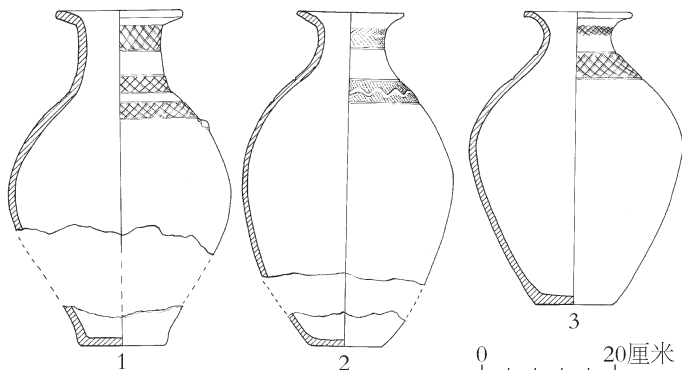
1、2、5、7、17、19.陶器底 3、14、15.陶壶 4、11.陶钵 6、18.陶杯
8、16.陶敛口罐 9、20.陶碗 10.陶钵 12、13.陶侈口罐

随葬品残存 20 件，包括壶 3 件、敛口罐 2 件、侈口罐 2 件、杯 2 件、盏 2 件、碗 2 件、钵 1 件及残器底 6 件，均为陶器，且破碎严重，多不能复原。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另有少量夹砂灰褐陶，烧制火候较低，陶色不纯，部分陶器出现外红内黑的现象，外壁均经过抹光处理，大型器物多在颈、肩或腹部施有纹饰，包括弦纹、戳印纹、刻划纹、附加堆纹及由前几种纹饰组成的复合纹饰等。陶器多为手制，其中较大的器物用泥条盘筑法，部分小型器物 and 附加堆纹等则直接用手捏塑而成。

陶壶 3 件。均残。器形高大厚重。夹砂红褐陶或灰褐陶。喇叭口，方唇，长颈，鼓腹，平底。外壁抹光，颈、肩部饰有刻划或戳印纹。M2 : 3，夹砂红褐陶。方圆唇，折沿，长颈近直，斜弧肩。颈、肩部共施有三组由弦纹和斜向交错刻划纹组成的复合纹饰。肩部复合纹饰下方饰有两个对称乳凸状附加堆纹。口径 18.6、腹径 34、底径 13.6 厘米，口部至腹部残高 32 厘米（图一三：1）。M2 : 14，夹砂红褐陶。方圆唇，斜弧肩，深腹，腹最大径位于肩腹部。颈、肩部分别施有一组由弦纹和斜向交错刻划纹组成的复合纹饰。口径 16、腹径 32、底径 12、通高 44 厘米（图一三：3）。M2 : 15，夹砂灰褐陶。方圆唇，斜弧肩，深腹微鼓，腹部最大径位于腹部中部偏上。颈、肩部部分别施有以弦纹和戳印纹组成的复合纹饰，其中肩部复合纹饰中留出一周波浪形空白带未施加纹饰。口径 16、腹径 32、底径 11 厘米，口部至下腹部残高 40 厘米（图一三：2）。

陶敛口罐 2 件。均残。夹砂红褐陶。敛口，斜肩，鼓腹，平底。腹部施有复合纹饰。M2 : 8，尖圆唇。沿外壁和腹部均施有长方格戳印纹，其中腹部以长方格戳印纹组成连续层叠的波折状纹饰。口径 10、腹径 16.6、底径 8、通高 14.2 厘米（图一四、一六：1）。M2 : 16，圆唇，斜弧肩。肩腹部

外壁均施有由刻划纹和附加堆纹组成的复合纹饰。口径 10、腹径 17、底径 7、通高 15.4 厘米



图一三 M2 出土陶壶

1.M2 : 3 2.M2 : 15 3.M2 : 14



图一四 出土陶敛口罐 (M2 :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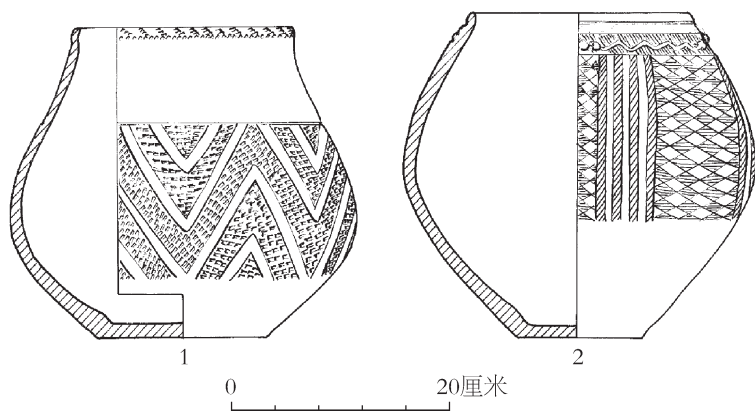


图一五 出土陶敛口鼓腹罐 (M2 : 16)

(图一五、一六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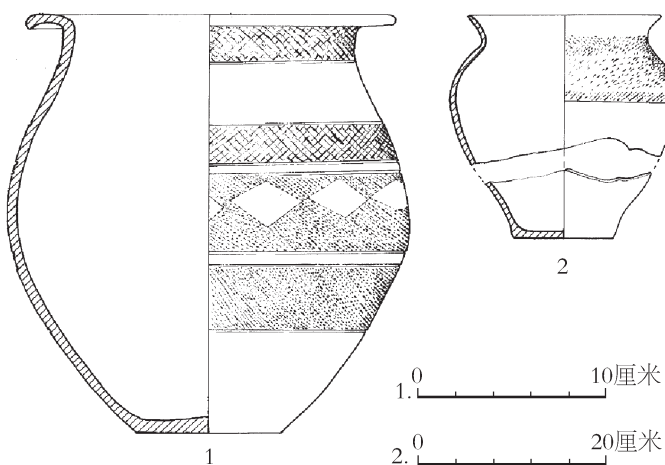
陶侈口罐 2 件。均残。夹砂褐陶。侈口，圆唇，鼓腹，平底。颈、肩或腹部饰有刻划或戳印纹饰。M2 : 12，夹砂红褐陶，局部因烧制时的火候不均而呈灰褐色。方圆唇，宽沿近平，斜

弧肩，腹部最大径位于腹中部。沿内壁饰有一周以刻划纹组成的三角形复合纹饰。颈、肩、腹部均施有以弦纹和刻划纹组成的复合纹饰，其中腹部复合纹饰内刻划出平行排列的菱形图案，图案内未施加纹饰。口径 19.8、腹径 21.4、底径 7.8、通高 22.4 厘米 (图一七 : 1)。M2 : 13，夹砂灰褐陶。尖圆唇，鼓肩，深腹。最大径位于肩部。颈、肩及上腹部饰有斜向不规则排列的短线刻划纹。口径 20.6、腹径 22、底径 10.6 厘米。口至腹部残高 16 厘米 (图一七 : 2)。



图一六 M2 出土陶敛口罐

1.M2 : 8 2.M2 :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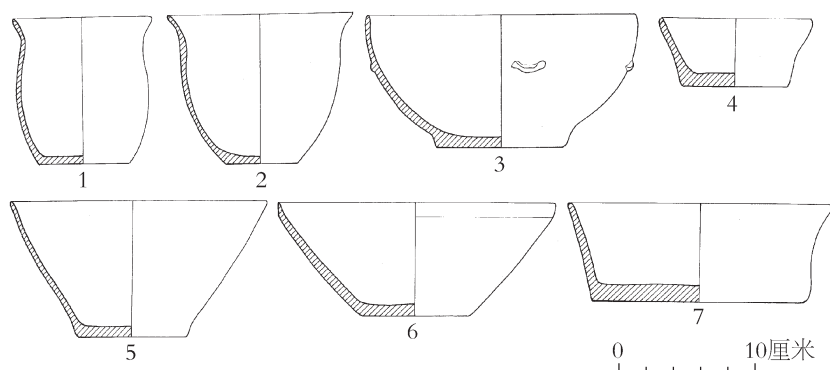
图一七 M2 出土陶侈口罐

1.M2 : 12 2.M2 : 13

陶杯 2 件。均残。夹细砂褐陶。侈口，圆尖唇，深腹微鼓，平底。素面。M2 : 6，夹细砂红褐陶。口径 10.2、腹径 9.6、底径 7、通高 10.8 厘米 (图一八 : 1)。M2 : 18，夹细砂灰褐陶。口径 13.6、腹径 11.6、底径 5.4、通高 11 厘米 (图一八 : 2)。

陶盏 2 件。均残。夹细砂红褐陶。敞口，圆尖唇，斜直腹，但上腹局部微鼓，平底。素面。M2 : 4，口径 11.2、底径 8.2、通高 5 厘米 (图一八 : 4)。M2 : 11，口径 19.4、底径 16、通高 7.2 厘米 (图一八 : 7)。

陶碗 2 件。均残。夹细砂红褐陶。敞口，尖圆唇，斜直腹，平底。素面。M2 : 9，口径 17.8、底径 8.2、通高 10 厘米 (图一八 : 5)。M2 : 20，口径 20.4、底径 8.2、通高 8.3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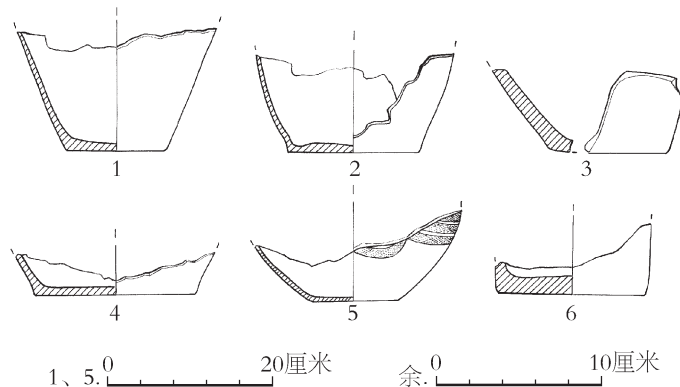
图一八 M2 出土陶器

1、2.杯 (M2:6、M2:18) 3.钵 (M2:10) 4、7.盏 (M2:4、M2:11) 5、6.碗 (M2:9、M2:20)

(图一八:6)。

陶钵 1件。M2:10, 残。夹砂红褐陶, 黑色陶胎。敛口, 弧腹, 平底。腹部饰有3处横向条形附加堆纹。口径19.6、底径9.8、高9.8厘米 (图一八:3)。

陶器底 6件。夹砂褐陶。均为平底。M2:1, 仅余下腹及底部局部。夹砂灰褐陶。下腹斜直。底径12、残存腹径24、残高14.6厘米 (图一九:1)。M2:2, 仅余下腹及底部局部。夹砂灰褐陶。下腹近直。腹径9.4、底径9、残高4.4厘米 (图一九:2)。M2:5, 仅余部分残片。夹砂灰褐陶。底径未能复原 (图一九:3)。M2:7, 仅余下腹及底局部。夹砂红褐陶。下腹斜直。素面。底径9.8、残高3厘米 (图一九:4)。M2:17, 仅余下腹和底部局部, 及少许残片。夹砂红褐陶。下腹弧形内收至平底。腹部及部分残片上可见以刻划纹和戳印纹组成的复合纹饰。



图一九 M2 出土陶器底

1.M2:1 2.M2:2 3.M2:5 4.M2:7 5.M2:12 6.M2:19

残存腹径26、底径11、下腹局部及平底残高10.4厘米 (图一九:5)。M2:19, 仅余下腹及底局部。夹砂灰褐陶。下腹微鼓。素面。底径8、残高6厘米 (图一九:6)。

三 结语

此次发掘清理的两座土坑墓, 尽管在清理前均已受到严重破坏, 但出土了20余件陶器, 为分析和判断墓主信息、墓葬年代等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线索和依据。

M1、M2在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位置相邻, 现存开口层位相同, 墓坑大小、深浅及墓向相近; 随葬器物仅见陶器, 并分组摆放于墓坑南北两端; 随葬陶器多为夹砂红褐陶, 另有少量夹砂灰褐陶, 未见泥质陶器; 陶器器表均经抹光处理, 除少量小型器物如杯、碗、钵、盏等未施或仅施简单纹饰 (如弦纹、条形附加堆纹) 外, 其余器物多在颈、肩或腹部施有刻划纹、戳印纹, 或以前两种纹饰为基本纹饰单元组成的复合纹饰均为平底器, 未见圈足、三足器。综合以上信息判断, M1、M2的年代应相同或相近, 墓主社会地位相近。

M1、M2出土的20余件陶器, 在陶质陶色、器型、纹饰等方面均与德昌县董家坡遗址^[1]早期地层和遗迹内出土的陶器 (陶片) 较为相似, 且 M1、M2 所在的大厂遗址与董家坡遗址均位于安宁河西岸, 两地相距仅约30千米。由此判断, M1、M2的绝对年代可能与董家坡遗址早期地层及遗迹年代相近。根据董家坡遗址发掘简报,^[2]该遗址早期地层及遗迹年代距今约4400~4000年, 由此推测, M1、M2的年代亦应在距今4000年左右。

(下转第23页)



羊耳坡遗址蛮子沟墓地以竖穴土坑、流行板状耳的双耳罐的文化特征完全不同,两者应属于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从蛮子沟墓地出土随葬品的器物组合、特征来看,它与雅砻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关系密切,如陶双耳罐、铜柄铁剑、铜剑鞘首、扣饰、铁器等均为川西石棺葬中出土的常见器型,尤其是在耳部和腹部施戳印纹的圈足双耳罐与盐源地区出土的双耳罐形态完全一致。^[6]

总之,羊耳坡遗址蛮子沟墓地是首次在安宁河流域发现与大石墓遗存时代接近却属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墓地内墓葬排列有序,打破关系较少,器物组合稳定清晰,器物特征显著,其考古学文化面貌具有典型性特征。羊耳坡遗址蛮子沟墓地的发掘对理清盐源青铜器物群的脉络、重新认识战国至西汉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格局、探索川西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西南夷民族的形成与迁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领队:唐 飞

发掘:郑万泉 连 锐 张 燕

尹芊雪子 孙 策 赵宗斌

(上接第 10 页)

此次所清理的两座墓葬,是安宁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时期考古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两座墓葬在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方面即有礼州遗址^[3]早段即西昌横栏山文化^[4]因素特征,同时在纹饰等方面则表现出另一种以刻划纹、戳印纹为基本组成单元的复合纹饰,即有学者将其命名为“衬花”纹饰^[5]为显著特点的不同文化因素特征,可能正反映出多种不同文化因素或体系、族群在安宁河流域的相互影响、交汇和融合。两座墓葬的清理,将进一步丰富安宁河流域早期考古材料,并为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安宁河流域早期社会经济形态、文化面貌、埋葬习俗等提供新的线索和资料,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和意义。

领队:万 娇

发掘:万 靖 李瑞佳 何 鑫

张 文 冷 昊

冉 兢 童兴茂 张利霞

刘红庆 辛春祥

线图:王 楠 尹芊雪子 白 芮

摄影:连 锐 郑万泉

航拍:徐海伦 孙 策

执笔:郑万泉 连 锐 张 燕

孙 策

注释:

- [1] 苏奎、尹俊霞:《试析西南夷地区的三叉格铜柄铁剑》,《四川文物》2005 年第 2 期。
- [2] 宋治民:《三叉格铜柄铁剑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考古》1997 年第 12 期。
- [3] 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 年第 4 期。
- [4] 谢崇安:《略论西南地区早期平底双耳罐的源流及其族属问题》,《考古学报》2005 年第 2 期。
- [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第 135~139 页,文物出版社,2006 年。
- [6]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第 42~58 页,文物出版社,2009 年。

绘图:曾玲玲 万 靖

摄影:万 靖 李瑞佳

执笔:万 靖

注释:

- [1] a.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9 年四川德昌县董家坡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 7 辑,第 495~525 页,科学出版社,2011 年;
b.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10 年四川德昌县董家坡遗址发掘简报》,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安宁河流域古文化调查与研究》,第 317~349 页,科学出版社,2012 年。
- [2] 同 [1]。
- [3] 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0 年第 4 期。
- [4] 江章华:《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试析》,《四川文物》2007 年第 5 期。
- [5] 王仁湘:《西南地区史前陶器衬花工艺探讨》,《四川文物》2008 年第 1 期。